线串珠联:书商与汪士钟藏书的流转

吴 善 松

内容摘要:汪士钟艺芸书舍藏书的散出是晚清藏书史上的关键事件,深刻改变了以江南为中心的藏书格局,催生瞿氏铁琴铜剑楼、杨氏海源阁等一批新兴藏书家的崛起。道光至光绪年间,汪氏藏书流转过程中,书商鲍芳谷、金顺甫、吴申甫、侯念椿等人通过批量收购、上门求售及坐店经营,促成典籍大规模转移,避免珍本毁于战火。这些书商不仅承担贸易中介,更为藏书家寻访目标典籍、提供版本信息、出借书籍以供校勘,并搭建起藏书家之间的沟通桥梁,成为推动书籍流转与学术传播的"无形之手"。以书商为串联线索的"珠线模式",突破了"从藏书家到藏书家"的传统研究范式,有效填补了藏书链条中的断层,为理解清代书籍流通网络的形成机制提供新的分析路径。

关键词:汪士钟藏书 书商 藏书流转 文献保存

引言

清代私家藏书发达,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,都达到了中国私家藏书发展的高峰。其间藏书名家辈出,而声名最显者当为乾嘉时期的"藏书四友"①和晚清四大藏书家。在二者之间的汪士钟艺芸书舍承上启下,对文献保存和书籍流转起过关键作用,是清代藏书史上必不可少的一环,在中

①"藏书四友"即周锡瓒、顾之逵、袁廷梼、黄丕烈。黄丕烈云:"近日吴中讲究古籍,自香岩、抱冲、寿阶二十余年来先后作古,藏书四友惟余老尧一人存矣。"又云:"余向属钱塘陈曼生作《藏书四友图》,四友中抱冲已作古三年,所存者三人耳。三人者何?香岩也,寿阶也,余也。"(黄丕烈撰,余鸣鸿、占旭东校补:《尧圃藏书题识校补(外六种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24年,第524、694页)

国藏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汪士钟(1786—?),字春霆,号朗园、阆源、艺芸主人等,江苏长洲(今苏州)人。居山塘街,有藏书处曰“艺芸书舍”。其父汪文琛,字厚斋,开益美联社布号,贾而好儒,富而收书①。汪士钟遍读其父藏书,“以为犹是寻常习见之本,必广搜宋元旧刻以及《四库》未经采辑者”②,于是“故郡中传流有名秘笈,搜求略遍”③。道光二年(1822),汪士钟将所藏宋元本编成《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》,请顾广圻作序,后又随收随补,完善成书。此外,尚有大量明刻精本、旧抄校本未编成目。汪士钟藏书散出后,沾溉南北各地藏书之家,其中大部分被完整保存,流传至今。

聚焦典籍之聚散,陈登原实开其先河,所著《古今典籍聚散考》专设“兵燹”“藏弆”二卷,已对汪氏藏书的流散及清季藏书格局之形成略有论述④。其后,郑伟章在通考清至现代藏书家时,亦将汪士钟及其藏书流转所涉主要藏书家纳入视野⑤。然目前学界对汪士钟藏书的研究多沿袭成说,仍停留于表面介绍,缺乏系统而深入的剖析。无论是汪氏之后藏书家的专案研究⑥,还是以个案方式对古籍递藏的

---

①详参郑伟章:《文献家通考(清—现代)》,中华书局,1999年,第595—598页;李峰主编:《苏州通史·人物卷(中)　明清时期》,苏州大学出版社,2019年,第320—321页。关于汪士钟及其家族的生平、世系、藏书情况等,尚须全面考证,笔者拟另撰文讨论。

②黄丕烈:《汪刻衢本郡斋读书志跋》,黄丕烈撰,余鸣鸿、占旭东校补:《荛圃藏书题识校补(外六种)》,第814页。

③顾广圻:《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序》,顾广圻撰,黄明标点:《思适斋书跋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9年,第167页。

④陈登原:《古今典籍聚散考》,商务印书馆,1936年,第353—376页。按,该书卷四“人事卷”专列“书贾”一章,已注意到书商与藏书家的关系,但主要批判书贾的“射利之害”与“伪造之罪”(陈登原:《古今典籍聚散考》,第496—500页)。

⑤郑伟章:《文献家通考(清—现代)》,第595—598页。

⑥如曹培根:《瞿氏铁琴铜剑楼研究》,苏州大学出版社,2008年,第67页;丁延峰:《海源阁藏书研究》,商务印书馆,2012年,第83—85页;李军:《松江读有用书斋韩氏家世考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2年第4期,第62—70页;沙嘉孙:《文登于氏藏书考》,王绍曾、沙嘉孙:《山东藏书家史略(增订本)》,齐鲁书社,2017年,第426—440页;李健:《清藏书家蔡廷相、蔡廷桢生平及藏书考》,《新世纪图书馆》2022年第3期,第82—89页;陈熙、王涵笑:《楼台海上:郁松年与宜稼堂藏书》,《图书馆杂志》2024年第11期,第117—126页;等等。

探析①,都延续传统藏书史的研究方法,通过考察书目著录和古籍钤印,揭示某部书从一个藏书家流传到另一个藏书家的动向,能够较好地解决“书从哪来、去往何处”(Where)的问题。这种“从藏书家到藏书家”式的研究,始终无法回答书籍如何流转(How)的问题,即一部书是如何从一个藏书家到另一个藏书家的。

实际上,此类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——书商。在书籍史的视域下,书商是书籍生命周期中不可或缺的角色,对古书的流转来说尤为关键。藏书家负责书籍的存藏,犹如一颗颗散落的珠玉;书商则负责书籍的贩售,如同串联珠玉的丝线,正是凭借书商的串联,藏书家的藏品得以相互衔接,二者共同织就有机的书籍流转网络。在这一“珠线模式”中,探究书商与藏书家之间的交易与互动,恰如分析丝线如何穿引珠玉,乃是理解整个书籍网络形成机制的关键。

近年来,关于书商与清代书籍流转的研究已渐成风气。徐雁平首次系统勾勒出清代书籍世界中这一活跃却长期隐没的群体,重构了当时书籍贸易的基本结构,并以丰富的案例生动呈现了书商的多元面貌②。张晨珲将书商的交往对象划分为顾客、著者、同行与亲族等类别,并归纳出交易、中介、合作出版、赠书借阅及代购代销等多种社交主题③,其分析框架颇具启发性。詹佳如、王晶晶则以乾嘉时期陶氏五柳居为中心,揭示出善本流通背后学术资源的整合与再分配机制④。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描绘了书商群体的活动图景,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清代书籍流通的网络,并强调书商在推动文献传播与学术交流中的重要作用。然而,既有成果多

---

①如杨金萍、刘更生、王振国:《从〈卫生家宝产科备要〉印鉴考察名家递藏》,《中华医史杂志》2006 年第 1 期,第 10—13 页;柳向春、宋飞:《宋本〈白氏文集〉递藏源流述略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08 年第 1 期,第 46—49 页;李春玲、张任:《国图藏明抄本〈集注太玄经〉传藏考略》,《图书馆研究》2016 年第 5 期,第 126—128 页;李秀华:《〈淮南子〉北宋本流传考辨》,《文献》2019 年第 6 期,第 103—116 页;等等。因汪士钟藏书多宋元善本,且大都流传至今,此类文章不在少数。

②徐雁平:《书估与清帝国的书籍流转》,《古典文献研究》第十六辑,凤凰出版社,2013 年,第 99—158 页。

③张晨珲:《清代江南地区书商的书籍社交网络研究》,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(李西宁、董广伟指导),2024 年,第 46—53 页。

④詹佳如、王晶晶:《“江南”的媒介:乾嘉时期陶氏五柳居的善本古籍生意》,《史学月刊》2025 年第 8 期,第 30—43 页。

未将视角聚焦于某一具体藏书家的藏书流散全过程,因而难以在完整的藏书网络中系统审视书商的关键职能。此外,因材料所限,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乾嘉时期,主要依赖黄丕烈题跋等文献,对道光以后——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书商活动关注不足。有鉴于此,本文以汪士钟藏书的散出与流转为脉络,广泛搜集清人书目、题跋、日记、尺牍等稀见原始文献,从中钩稽与书商相关的记载,力图在厘清汪氏藏书流传轨迹的基础上,阐明书商在其间发挥的中介与联结作用,进而借此个案揭示清代藏书网络的整体运行机制。

一、批量收购:汪氏藏书散佚初期的书商活动

《〔同治〕苏州府志》云:"观察多子,身后兄弟瓜分,家亦落,其书始散。经庚申之乱,扫地尽矣。"①今检汪氏早期散出之书,部分钤有汪振勋(如宋本《中兴馆阁录》《愧郯录》《补注蒙求》等)、汪宪奎(如宋本《资治通鉴》《新雕孙真人千金方》《扬子法言》等)、汪骏昌(如元本《石田先生文集》等)和汪澂(如宋本《会稽三赋》等)等人印记,且每种书仅有一人印记,呈现明显的独立性,当即汪氏身后被瓜分者。而今见汪氏旧藏中,钤有汪士钟之子汪德英印记的,只有宋刻本《重雕足本鉴诫录》②一种。潘世恩第五女嫁给汪德英③,其后汪、潘二家有"累世通婚之谊",潘景郑感叹道:"(汪氏)迄今子姓犹繁,惟业贾者多,知簿录者无一人,询以旧藏,则瞠乎莫辨矣。"④江标与汪士钟曾孙汪国照(字叔雍)交善,也仅称其"工书"而已⑤。汪氏因经营布业成巨商,"乾嘉时富甲吴下"⑥,至道光间则没落。其后人只知商贾而不知书,致使藏书大量流散,被书商捆载售去。在汪士钟藏书流散的初期,发挥主要作用的有鲍芳谷、庞昆圃和金顺甫三人。

---

①李铭皖等修,冯桂芬等纂:《〔同治〕苏州府志》卷一四九,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九年(1883)江苏书局刻本(索书号:地 220. 175/138),叶四十二。

②何光远:《重雕足本鉴诫录》十卷,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(索书号:863346-47)。该本钤有汪士钟、汪宪奎印记,以及汪德英"汪德英印"白文方印、"珠林"朱文方印。

③潘世恩《思补老人手订年谱》载,道光十五年,"五女于归平阳汪德英,候补道士钟朗源子"(薛贞芳主编:《清代徽人年谱合刊》下册,黄山书社,2006 年,第 923 页)。潘世恩,字槐堂,号芝轩,江苏吴县人。潘祖荫祖父,潘景郑高祖父。

④潘景郑:《著砚楼书跋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 年,第 130 页。

⑤江标著,黄政整理:《江标日记》上册,凤凰出版社,2019 年,第 169 页。

⑥潘景郑:《著砚楼书跋》,第 130 页。

(一)鲍芳谷收售汪氏善本

鲍芳谷,名振方,常熟人。道咸间书估,善抄书,又“喜藏古书,人间秘本半皆寓目”①,与张蓉镜、胡珽、瞿绍基等藏书家相往来,撰有《金石订例》四卷,可称为学者型书商。其子鲍廷爵,字叔衡,号奂甫,曾任浙江候补知县。室名“后知不足斋”,辑刊《后知不足斋丛书》。承父业,在常熟寺前街开设抱芳阁书店,经销古旧书,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,避祸迁至上海。缪荃孙、姚觐元等人常往购书。

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,在张蓉镜“心境极愁郁郁时”,鲍芳谷携汪氏旧藏明初刻本《伊川击壤集》至,张氏爱不释手,“以精钞《营造法式》同其易换”。张氏同年所得者还有影宋抄本《武经七书》。两书都有张蓉镜题跋,详细记载了汪氏藏书流散的动态:

> 《击壤集》宋刻罕见,此部首尾完整,叠经收藏家所重。余于道光乙巳十一月中,心境极愁郁郁时,书友鲍芳谷携来郡城汪阆源艺芸书屋所散出者,爱不能释,以精钞《营造法式》同其易换,此作价洋钱二十元,合足钱二十八千文,取其宋刻之全帙可贵也。汪氏书贵而难得,乙巳春,鲍芳谷同庞昆圃到郡,所得精本,惜大半售之上海郁泰峰处,此则硕果之存也。丙午又五月廿八日芙川挥汗草记。②
>
> 此书(引者按,指《武经七书》)本是宋刻初印本,道光乙巳秋,郡城汪阆原所藏散出,为鲍芳如〔谷〕转售上海郁泰峙处。此由鲍氏影摹宋本印写,今宋本不得见矣,阅此如唐欧晋帖,宜珍也。③

此年汪氏所藏宋刻《武经七书》等善本已开始散出,由书商鲍芳谷与庞昆圃合作,转售予郁松年。关于郁松年藏书的来源,陈熙等学者在

---

①鲍懋恒、鲍廷爵:题识,鲍振方:《金石订例》卷首,天津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年(1884)常熟后知不足斋刻本(索书号:TT 253883),叶一。

②瞿启甲辑:《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》卷四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9年,第232—233页。按,明初刻本《伊川击壤集》后归瞿氏铁琴铜剑楼,现藏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07031)。张、瞿皆视作宋刊本,实为明初刻本。

③徐乃昌撰,柳向春、南江涛整理:《积学斋藏书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20年,第117页。按,清鲍芳谷影宋抄本《武经七书》,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(索书号:平图011483-011484)。鲍芳谷之“谷”字,《积学斋藏书记》误作“如”,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著录失误。

研究时仅引用陈奂《师友渊源记》的简要记载，对其中细节则无说明①，张蓉镜的这两条题跋可补其未备。宋本《武经七书》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（函架号：4-12），全书末叶钤“鲍芳谷印”白文长方印，可知确曾经鲍芳谷之手。鲍氏得书后影抄一部，归于张蓉镜家。其影抄录副之动机或涉售卖，然客观上于文献保存不无裨益。张蓉镜的两则题跋不仅揭示了汪氏藏书去向和郁氏藏书来源，还详细记录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参与者，对藏书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。

不仅汪士钟藏书由鲍芳谷经手，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散出后也由鲍芳谷经手。例如，咸丰三年（1853）仁和胡珽木活字印《琳琅秘室丛书》本《丁鹤年集》，卷后《丁鹤年集校讹》有胡氏题识曰：

> 惟爱日精庐有元刻四卷之本，访诸虞山书友鲍芳谷，知售去久矣。阅六年，金顺甫自山塘汪氏携三卷之本归余，为明正统刊本，黄荛圃先生以元本校于上下方。余循次钞之，无如次叙淆乱，批校模糊。正欲再觅善本，芳谷适得张氏影元钞本赠余，与元刻惟妙惟肖。②

鲍氏所赠“影元钞本”，盖收得张金吾藏元刻本后影抄者。鲍芳谷也与恬裕斋主人瞿绍基相善，瞿氏藏宋刊本《周易象义》的《十翼》部分，即鲍芳谷“觅得以贻”③。张金吾《金文最》副稿百卷，后归于瞿氏恬裕斋，鲍芳谷借出请人缮写，黄廷鉴道光二十年跋称其“明于书籍，勤购访”，又云“甚嘉芳谷之能好事，为此书多一传本也”④。无论是赠送书籍，还是充当“中间人”，鲍芳谷都促进了书籍的流转，体现出书商的重要作用。书商与藏书家之间的这种非商业性交往，值得进一步研究。

鲍芳谷在藏书家题跋中被称为“书友”，其身份或近于“去官业贾”⑤

---

①陈熙、王涵笑：《楼台海上：郁松年与宜稼堂藏书》，《图书馆杂志》2024年第11期，第119页。

②胡珽：《丁鹤年集校讹》，《丁鹤年集》卷末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清咸丰三年（1853）木活字印本《琳琅秘室丛书》（索书号：082.1-R572K），叶一。

③瞿镛编纂：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一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29页。下文简称“瞿《目》”。

④张金吾著，郑永晓整理：《爱日精庐文稿》，凤凰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127页。

⑤黄丕烈跋抄本《近事会元》云：“萧山李柯溪侨居吴市，颇收古书……柯溪去官业贾……其所收书，大概为转鬻计。”（黄丕烈撰，余鸣鸿、占旭东校补：《荛圃藏书题识校补（外六种）》，第299页）

一类;而张蓉镜题跋中同时提到的庞昆圃,其身份则与鲍芳谷有所不同。

(二)庞昆圃的书籍活动

庞昆圃,名钟琳,字昆圃,江苏常熟人。增贡生,历署靖江、青浦等县训导①。与翁同龢、赵烈文、赵宗建等交善,《翁同龢日记》《赵烈文日记》多记其往来。庞氏为常熟地方望族,又是藏书世家。庞昆圃虽并未以书籍贸易为本业,但却曾与鲍芳谷共同完成一桩重要的汪氏藏书商业交易,是文人参与书籍贩卖的一个典型案例,故亦放在本节讨论。

道光二十五年,庞昆圃与鲍芳谷将汪氏所藏部分善本携至上海,售予郁松年。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日,庞昆圃携影抄宋本《窦氏联珠集》、影抄元本《孔氏祖庭广记》赠予翁心存,翁氏日记称"此二书皆昆圃新得之郡中汪氏者,予属其传钞,昆圃乃命工钞以遗予"②,则庞氏收得宋本《窦氏联珠集》和元本《孔氏祖庭广记》的时间大概在道光二十八年六月间。庞氏得此二书后,各影抄一部,将影抄本赠送给翁心存,而将原本售予瞿镛。瞿《目》著录宋刻本《窦氏联珠集》云:"此即义门所得之叶氏藏本,为顾大有旧物;后入士礼居黄氏,艺芸书舍汪氏,邑中庞氏,今归余。"③庚申之乱后,此书为赵宗建收得,《旧山楼藏书记》叙其源流甚详④。后又经缪荃孙、刘承幹、潘宗周插架,现藏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08737)。瞿《目》在著录元本《孔氏祖庭广记》时虽未提及汪、庞二人,但卷内钤有汪士钟诸印记,可知确经汪氏收藏,即翁心存所见庞氏新得之本。此书散出后为陈清华收得,后亦捐给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09594)。

除了上述两种外,庞昆圃至少还应该经手过汪氏旧藏宋刻本《北山小集》、明雁里草堂抄本《铁围山丛谈》等善本。瞿《目》著录影抄宋本《北山小集》云:"黄氏百宋一廛尝得宋刻本,用公牍故纸印刷……此即从

---

①吴仁安:《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9 年,第 507 页。

②翁心存著,张剑整理:《翁心存日记》第 2 册,中华书局,2011 年,第 661 页。按,《孔氏祖庭广记》实为蒙古乃马真后元年(1242)孔氏刻本,本文从旧称。

③瞿镛编纂: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二三,第 647 页。

④《旧山楼藏书记》云:"此书归士礼居,后为吾邑庞昆圃所得。由庞归于罟里村瞿氏铁琴铜剑楼,遭庚申之变,不知何时流落于外。阅二十年,忽见于书贾之手,遂为予所得。"(赵宗建:《旧山楼书目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 年,第 77 页。与马瀛撰,潘景郑校订《吟香仙馆书目》合一册)按,赵宗建所藏亦购自书商,可见书商对书籍流转和文献保存的作用。

之传录者……宋本后归汪氏，今归邑中庞氏。”①宋本后归张钧衡适园，现藏台北汉学研究中心（索书号：402.53 10399）。瞿《目》著录旧抄本《铁围山丛谈》云：“邑中庞氏藏有雁里草堂钞本。”②咸丰六年，庞昆圃曾携明雁里草堂抄本《铁围山丛谈》至铁琴铜剑楼，盖欲售予瞿氏。彼时季锡畴正在瞿家为其校书，因而获见此本，据以校瞿氏藏清抄本，有跋云：“时恬裕主人镜之、濬之昆季，搜访古本，补入《藏书记》中，属余襄校，因记之。”③瞿《目》当据季锡畴所见补入。此本在庞氏之后下落不明，现藏上海图书馆（索书号：753831-33）。藏书家通常不会在生前轻易出售珍藏，而庞氏所获汪氏诸书仅钤有汪士钟本人印鉴（如“汪士钟印”白文方印、“阆源真赏”朱文方印），未见其族人印记。由此推断，这批藏书极可能于汪士钟在世时便已易主，或为其家道中落、不得不鬻书度日之佐证。

（三）金顺甫售书杨、于二家

书商金顺甫之名，多见于胡珽、韩应陛、于昌遂、季锡畴等人题跋中。胡珽咸丰三年《葬书释注校讹》题识云“原书系明初刊本，每半页十二行，行廿一字。书友金顺甫宝昇携来”④，可知其名曰宝昇。季锡畴称其为“湖估金顺甫”⑤，韩应陛称“苏州金顺甫”⑥，于昌遂称“吴下书友金顺甫”⑦。湖估是“最有影响、见诸文献记录最多”的一个书商群体，他们以环太湖

①瞿镛编纂：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二一，第573页。按，瞿氏藏本为清道光五年（1825）袁氏贞节堂抄本，现藏国家图书馆（索书号：04271）。道光二年，黄丕烈因与修郡志之故，从汪氏借出宋本《北山小集》影抄，道光五年袁廷梼又从黄氏影抄本传录。

②瞿镛编纂：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十七，第447页。

③瞿启甲辑：《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》卷三，第180页。按，季锡畴所校瞿氏藏清抄本，现藏国家图书馆（索书号：06932）。

④胡珽：《葬书释注校讹》，《刘江东家藏善本葬书》卷末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清咸丰三年（1853）木活字印本《琳琅秘室丛书》，叶一。

⑤季锡畴：题识，吕祖谦：《新刊详增补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》卷首，国家图书馆藏明正德六年（1511）刘氏安正堂刻本（索书号：04202）。

⑥邹百耐纂，石菲整理，陈先行审定：《云间韩氏藏书题识汇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0年，第25页。周叔弢撰，赵嘉、王振伟标注：《弢翁古书经眼录标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1年，第62页。

⑦于昌遂：题识，宋伯仁绘并辑：《梅花喜神谱》卷末，影印上海博物馆藏宋景定二年（1261）刻本，《中华再造善本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5年。

地区为活动中心,对书籍的搜求十分细致深入。钱景开、陶五柳、施汉英等人皆是湖估①。金顺甫为居住在苏州的湖估,故能频繁参与汪氏藏书的贩卖。

1. 海源阁藏书的汇聚

道光二十年,杨以增在继承其父杨兆煜藏书并陆续收购部分善本的基础上,建"海源阁"藏书楼于家乡聊城,之后便开始大量访求书籍②。道光二十八年,杨以增补授江南河道总督,治所在江苏清江浦(又称袁江或袁浦,今淮安),当时有不少书商沿河而上,向杨氏售卖书籍。

道光二十八年至三十年间,杨以增陆续购得宋本《孙可之文集》、宋淳熙刻耿秉重修本《史记》、宋刻抄补本《三国志》、宋本汤汉注《陶靖节先生诗》、宋本《陶渊明集》、宋嘉泰刻本《注东坡先生诗》、宋刻本《孟东野诗集》及"明王文恪公手写文集"③等善本,其中明确称得自书商者有宋本《孙可之文集》和明王文恪文集。《楹书隅录》卷四"宋本罗昭谏甲乙集十卷四册一函"条曰:"昔居袁江,估人持士礼居藏宋刊四唐人集求售。可之、昭谏、朱庆余三种,皆延令故物也。惜《甲乙集》为他人所得。"④宋刻本四唐人集中,《孙可之文集》《甲乙集》《朱庆余诗集》三种为汪氏旧藏,皆由书商售出。其中仅《孙可之文集》为杨氏收得,而《甲乙集》《朱庆余诗集》则归瞿氏铁琴铜剑楼。三者现均藏于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分别为:13309、01094、07007)。又《楹书隅录续编》卷四"明王文恪公手写文集不分卷"条曰:"道光己酉获之袁江,估人得自吴郡故藏书家。"⑤其他各书,或称"得之吴门",或称"访之吴门"⑥,大概皆由书商经手,而非直接购自汪氏。

---

①详参徐雁平:《书估与清帝国的书籍流转》,《古典文献研究》第十六辑,第99—158页。

②详参丁延峰:《海源阁藏书研究》,第81—82页。

③杨绍和撰,傅增湘批注,朱振华整理:《藏园批注楹书隅录》,中华书局,2017年,第371页。按,此本下落不明,未详书名如何,今从《楹书隅录》之称。

④杨绍和撰,傅增湘批注,朱振华整理:《藏园批注楹书隅录》,第199页。标点略有改动。

⑤杨绍和撰,傅增湘批注,朱振华整理:《藏园批注楹书隅录》,第371页。

⑥《楹书隅录》卷二"宋本史记一百三十卷二十四册四函"条曰:"道光己酉,以三百金得之吴门。"《楹书隅录》卷四"宋本陶靖节先生诗四卷二册一函"条曰:"洎道光己酉、庚戌间来帅南河,访之吴门,于是两《陶集》始先后收弃之。"(杨绍和撰,傅增湘批注,朱振华整理:《藏园批注楹书隅录》,第58、162页)

咸丰元年至二年间,杨以增持续大量收书,以汪氏旧藏为多。《楹书隅录》卷五“元本梅花百咏一卷一册”条曰:“咸丰辛亥,有估人持此本与宋刻《梅花喜神谱》来袁江求售,余极思并购之。而《喜神谱》忽为他人携去,至今犹萦之梦想云。卷末有汪、黄二家印。”①按,咸丰辛亥即咸丰元年,此估人即金顺甫。宋本《梅花喜神谱》在上一年已售予于昌遂,旋为蒋仲篱攫去,是年金顺甫又为于氏觅回②,元本《梅花百咏》盖同时携售予杨以增。由此判断,将汪氏其他藏书售予杨以增的书商,最有可能是金顺甫。

道光末、咸丰初,杨以增陆续购得汪氏藏书之善本,见于《楹书隅录》正续编著录者有 73 种,超过《楹书隅录》收书总数的四分之一。通过进一步搜访,并参考《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》③的著录,今统计杨氏海源阁所得汪氏藏书有 86 种,实际上可能更多④。可以说,汪氏旧藏是海源阁藏书的主要来源。咸丰三年,兵火延烧至清江浦,杨以增将大批善本“载归陶南别业”⑤,又经过杨绍和、杨保彝、杨敬夫三代人保藏,得以流传至今。

2. 文登于氏藏书的来源

东鲁藏书家,在聊城杨氏外,当推文登于氏。于昌进,字湘山,山东文登(今属威海市)人。官睢南同知,后任里河同知,署淮阳兵备道,为杨以增下属。有藏书处曰“小谟觞馆”。弟昌遂,字汉卿,号养志园主人,齐学裘婿。廪贡生,候补知州。后居清江浦,晚年卜居扬州。喜读书、藏书,有羼提精舍、青棠红豆庐、享帚斋、尺月楼。著有《羼提精舍诗稿》十二卷⑥。

于昌进、昌遂昆仲得汪氏旧藏善本颇多,主要购自书商金顺甫之手。

---

①杨绍和撰,傅增湘批注,朱振华整理:《藏园批注楹书隅录》,第 249 页。

②于昌遂:题识,宋伯仁绘并辑:《梅花喜神谱》卷末。

③王绍曾、崔国光等整理订补:《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》,齐鲁书社,2002 年。

④据丁延峰统计,《楹书隅录》载汪氏书达 50 部,而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所载汪氏书不足 10 部,故其认为汪氏藏书散出后所得最多者是杨以增(丁延峰:《海源阁藏书研究》,第 85 页)。实际上,《楹书隅录》和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著录的藏书印皆不全,故仅据之考察汪氏藏书的流散必然会有遗漏。笔者初步统计瞿氏所得汪氏藏书共有 128 种,超过杨氏的 86 种。但两家旧藏尚未全部公开,仍有部分藏于图书馆、博物馆不为人知,故各家所得汪氏藏书数目,尚无定论。

⑤杨绍和撰,傅增湘批注,朱振华整理:《藏园批注楹书隅录》,第 55 页。

⑥详参王晓娟:《藏书家于昌遂及其〈羼提精舍诗存〉》,《藏书家》第 18 辑,齐鲁书社,2014 年,第 23—26 页。

其中最著名的是宋景定二年刻本《梅花喜神谱》,卷末于昌遂题识云:

> 岁庚戌,吴下书友金顺甫以百宋一廛书来售,仲氏出清俸购数十种。予分得《梅花喜神谱》一册,不啻获异珍也。①

庚戌,即道光三十年(1850)。仲氏,即于昌进,于昌进有"清俸买来"白文椭圆印,正与此跋中"出清俸购数十种"相合。所谓"百宋一廛书",即黄丕烈旧藏,如宋余仁仲本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、宋嘉定刻本《中兴馆阁录》、宋景定刻本《梅花喜神谱》、宋刻本《淮南鸿烈解》、宋刻本《愧郯录》、宋刻本《重雕改正湘山野录》、宋尹家书铺刻本《续幽怪录》、宋蜀刻本《孟浩然诗集》、宋刻本《嘉祐集》等九种宋本,皆曾归汪士钟,又为于氏收得。胡珽《续幽怪录校讹》题识云:"咸丰纪元之秋,自钱伊人处阅三十五峰园汪氏书目,载有此名,即诧为奇秘。急令求之,知于前一岁为金顺甫售去。"②前一岁,即道光三十年,与于昌遂跋所称金顺甫售书时间相吻合。此时宋本《续幽怪录》已为于氏收得,胡珽求之未得。今见于氏所藏汪士钟旧藏,初步统计共有 28 种,除上述宋刻本外,还有部分明刻精本、旧抄本。其中明正德刻本《唐王建诗集》、明刻本《刘宾客文集》、明弘治刻本《石屏诗集》、明抄本《张说之文集》、清叶树廉抄本《大金国志》等数种,皆经黄丕烈校勘或题跋,盖同时得自书商金顺甫者。

总之,道光后期汪士钟因家道中落,部分藏书被族人瓜分,后渐流散,被书商鲍芳谷、金顺甫等批量收购,售予郁松年、张蓉镜、瞿镛、杨以增、于昌进等藏书家,实现了汪氏藏书散佚初期的有序流转。

二、上门求售:咸丰兵燹之际汪氏藏书流转中的书商活动

咸丰间,太平天国运动爆发,江南地区战事激烈。中国传统藏书核心地区遭遇兵燹冲击,《四库全书》的"南三阁"仅剩文澜阁残存,私人藏书楼也被大量摧毁,书籍流散。汪氏藏书在此时大量散出,书商的活动也愈加频繁,往来奔走各地,实现了汪氏藏书的迅速流转。

(一)藏书家避难与书籍的散聚

咸丰三年(1853),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,占领南京,随即攻占镇江、扬州,咸丰十年又陆续攻占杭州、常州、无锡、苏州、嘉兴等城市。各地藏

---

①于昌遂:题识,宋伯仁绘并辑:《梅花喜神谱》卷末。

②胡珽:《续幽怪录校讹》,李复言:《续幽怪录》卷末,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清咸丰三年(1853)木活字印本《琳琅秘室丛书》,叶三。

书家纷纷奔走避难，如长洲徐康“避兵在沪”①，昭文李芝绶、常熟赵宗建“避寇崇川”②，归安章绶衔“避迹海上”③，仁和胡珽“避难于常熟西庄”④，钱塘丁丙、丁申流离迁徙上海⑤，古里瞿氏则先后将藏书转移至常熟乡村、太仓苏家、江北海门等地⑥。

与这些藏书家一样，汪氏也携书避难，奔走他处，致使藏书大量流散。光绪七年（1881），吴郁生曾见汪氏旧藏宋本《颜氏家训》《鉴戒录》，皆是“汪氏子姓避难携出者”⑦。然汪氏藏书体量庞大、搬运艰难，汪氏子姓仅能携带少量珍贵善本，大量普通典籍或因仓促迁徙被遗弃。汪士钟曾孙汪国照称“乱后藏书皆未携出，尽为一书贾攫去”⑧，《清朝野史大观》也有类似说法：“粤寇至，合家离散，宋元善本悉为邻家携去。”⑨所谓“皆未”“悉为”等，存在夸张成分。早在道光年间，汪氏大量善本就已散出，被书商鲍芳谷售予郁松年、张蓉镜等人；咸丰初，部分善本也被杨以增、韩应陛等人购去。而叶廷琯《吹网录》云“庚申变后，汪氏藏书未售者不暇携出，尽被人攫去”⑩，则应该与实际情况相符。

（二）作为书籍集散中心的荡口

荡口镇位于无锡市东隅，地处无锡、苏州、常熟三地交界。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加上便利的水路交通、地方团练势力和士绅大族的庇

---

①陈先行、郭立暄编著：《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附版本考》下册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610页。

②刘心明主编：《子海珍本编·大陆卷》第一辑，凤凰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798页。按，崇川，通州之别称，即今江苏南通。

③严绍璗编著：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》中册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946页。

④胡珽：题识，叶廷琯、胡珽：《石林燕语集辨》内封，南京图书馆藏稿本（索书号：GJ/EB/115635）。

⑤石祥：《八千卷楼书事新考》，中西书局，2021年，第22页。

⑥张瑛：《知退斋稿》卷三《虹月归来图记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94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551页。

⑦王欣夫撰，鲍正鹄、徐鹏整理：《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》上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1年，第530页。按，吴郁生，字蔚若，号钝斋，江苏吴县人。光绪三年进士。

⑧江标著，黄政整理：《江标日记》上册，第174页。

⑨上海书店编：《清朝野史大观》卷十《清朝艺苑》，上海书店，1981年，第70—71页。

⑩叶廷琯：《吹网录》卷五，南京图书馆编：《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·子部》第49册，凤凰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310页。

护，使得荡口成为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一个便于逃亡和相对安全的地方。当时，苏州城很多士绅都携藏书躲到荡口①。蒋凤藻《心矩斋尺牍》记载：

> 荡口张姓，乱中所得宋元椠、名校、旧钞珍本不少。前闻侯〔侯〕念椿言，张氏先得汪阆原家精本一船。盖汪氏避难在彼，被土匪抢去，一船书籍尽入张姓。且于山塘经营时所得诸书，精本尤多，堆积空房中，随时董理，每以重复诸本出售。②

张姓书商是荡口人，具体名号不可知，在苏州山塘街开设书肆，所售书籍皆精善之本。由于汪氏藏书大量流散于荡口，该地区及附近又聚集诸多藏书家，一时间，荡口镇成为重要的书籍集散中心。吴郁生少时随其父在荡口避难，曾经历当时盛况："是时吾邑汪氏藏书星散，贩卖者至论斤以售，行箧难携，徒为惋叹。"③考诸文献，在荡口收得汪氏书的藏书家，主要有蔡氏兄弟、华湛恩、赵元益、徐康等人。

蔡廷相，字孙峰，号伯卿，江苏金匮（今无锡）人，居张塘桥。弟廷桢，字慕周，号卓如。二人合称"梁溪蔡氏"，有醉经轩④。孙毓修《太和正音谱跋》称"值汪氏艺芸书舍之书不守，倾囊得之，所储益富"⑤。醉经轩藏书精品甚多，有黄丕烈、汪士钟旧藏宋元本、孤本几十种。蔡氏兄弟与张姓书商同乡，所收汪氏旧藏得自张氏的可能性非常大。王欣夫云："当太平军光复苏州，汪氏艺芸书舍后人舟载其藏书，避地无锡荡口镇。孙峰获其精华，余则归亡友赵君学南先德静涵先生元益。"⑥光绪间，蔡氏藏书流散，主要被姚觐元、陆心源等人收得。国家图书馆藏抄本《深雪偶谈》（索书号：15347）书末附有《丙戌冬咫进斋购蔡氏书目》，著录版本、卷册、印章十分详尽，共有书目 59 条，皆光绪十二年姚觐元所购蔡氏醉经轩藏书，

---

①江澄波口述，韦力、张颖整理：《书船长载江南月：文学山房江澄波口述史》，古吴轩出版社，2025 年，第 15 页。

②蒋凤藻：《心矩斋尺牍》，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民国三十年（1941）排印本，第 2 页。

③王欣夫撰，鲍正鹄、徐鹏整理：《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》上册，第 530 页。

④详参李健：《清藏书家蔡廷相、蔡廷桢生平及藏书考》，《新世纪图书馆》2022 年第 3 期，第 82—89 页。

⑤孙毓修撰，乐怡整理，吴格审定：《小渌天书录　小渌天藏书目》，中华书局，2024 年，第 224 页。

⑥王欣夫撰，鲍正鹄、徐鹏整理：《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》上册，第 60 页。

其中有汪氏旧藏22种①。姚氏藏书售予京师图书馆,现藏国家图书馆;陆氏藏书则东渡日本,藏于静嘉堂文库。

华湛恩,字孟超,号紫屏,江苏金匮人。贡生,官安徽太和县学教谕、兵马司副指挥。家富藏书,熟于邑中掌故②。华氏世居荡口,为当地士绅大族。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》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三日云:"午后建霞来……述其外家华氏藏书甚富,有名湛恩字紫屏者尤好事,陆存斋所得北宋本《白帖》即其物。"③华湛恩曾收得部分汪氏旧藏,应来自张姓书商,惜可考者不多。华氏为江标(字建霞)舅家,光绪十二年五月初七日,江标在华氏义庄检得元张伯颜本《文选》九册,卷一至九为汪氏旧藏④。

江标表兄赵元益,字静涵,号高斋,江苏新阳人,华湛恩外孙。《峭帆楼善本书目》赵诒琛序云:"先君子生长于金匮荡口镇华氏外家……咸丰庚申,苏、常陷于粤匪,故家珍异辇至荡口避难,时先君子年方及壮,尽力购求宋、元、明、国初刻本及名人手钞书册约数百种。"⑤汪氏后人即辇书至荡口避难的"故家"之一,赵元益曾得黄丕烈、汪士钟旧藏数种。叶廷琯《吹网录》载,汪氏藏宋本《史载之方》曾流至荡口,"为赵某以洋饼二易得"⑥。赵某,即赵元益。叶昌炽亦记载此事云:"昆山赵君静涵,名元益,亦华氏甥,有《史载之方》宋本售于皕宋楼,今藏书尚多能读能守。"⑦可相印证。此外,赵元益所得汪氏旧藏,尚有宋淳熙刻《通鉴纪事本末》残本、宋刻明印本《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》、元刻白文《尚书》残本、明嘉靖仿宋刻本《嵇中散集》、明抄本《五行类事占》、明抄本《萍州可谈》、清抄本《东国史略》、旧抄本《抱朴子内外篇》等。同治十二年初,萧穆入职

①姚觐元撰,林振岳整理:《咫进斋善本书目(外三种)》,中华书局,2024年,第251—262页。

②华翼纶:《荔雨轩文集》卷六《从伯紫屏公行略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52册,第124—125页。

③叶昌炽:《缘督庐日记》第2册,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1113页。

④江标著,黄政整理:《江标日记》上册,第170页。

⑤赵诒琛编:《峭帆楼善本书目》卷首,林夕主编,煮雨山房辑:《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·近代卷》第26册,商务印书馆,2005年,第539页。

⑥叶廷琯:《吹网录》卷五,《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·子部》第49册,第310页。

⑦叶昌炽:《缘督庐日记》第2册,第1113页。

上海广方言馆，结识赵元益，二人往来密切。萧穆频繁从赵氏借阅珍本秘籍，或至赵氏处观书，皆记录于日记及《旧书所见录》①中，赵氏藏书也因其著录而为人所知②。

徐康，字子晋，号窳叟，江苏长洲（今苏州）人。诸生。博雅嗜古，精鉴赏。徐康所得汪氏藏书之时间与数量，可从其题跋考见。如咸丰十一年跋宋本《梁谿先生文集》云："去冬汪氏艺芸散书，仆亦收得百余种，惜无干净土藏储。"③去冬，即咸丰十年冬。又跋明嘉靖本《南唐书》云"今于上海旅次得汪氏藏本"④，跋旧抄本《玉斗山人集》云"此集旧藏艺芸书舍，咸丰十年冬得于古春申浦"⑤，皆咸丰十年所得汪氏藏书。又同治五年跋明刻本《支道林集》云："曩岁辟兵海上，书贾从荡口、虎邱捆载而来，皆艺芸书舍汪氏藏本，因无力多购，且遭难以来，百念俱灰，仅收得一二百种。"⑥此跋可与宋本《梁谿先生文集》跋相印证，"曩岁"当即咸丰十年。咸丰十一年，徐康仍在上海避难，又收得汪氏藏《书苑精华》等书⑦。咸丰十年至十一年间，书商从荡口、虎丘载书至上海售卖，徐康共收得汪氏旧藏一百余种。虎丘位于苏州城西北的长洲县，与山塘街西端接壤。张姓书商在荡口收得"一船"汪氏藏书，同时又在山塘街开设书铺，这与徐康题跋所记书商的贩书来源（荡口、虎丘）相吻合，因此有理由推测，徐康所得汪氏藏书应该是出自荡口张姓书商之手。

一个地方成为书籍集散中心的必要条件有三个：一是书籍资源，即可交易的商品；二是买书者，主要是藏书家；三是卖书者，主要是书商。只有具备这三个核心条件，书籍贸易才能展开，才有可能形成书籍市场。而合适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，则是重要的辅助条件。荡口之所以成为书籍集散中心，除了具有位于无锡、苏州、常熟三地交界的地缘优势，本就交

①萧穆：《旧书所见录》，南京图书馆编：《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》第44册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17年。

②详参徐雁平：《编织的艺术：萧穆日记中的书籍与文学世界》，凤凰出版社，2023年，第77—83页。

③陈先行、郭立暄编著：《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附版本考》下册，第576页。

④马令：《南唐书》卷末，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）顾汝达刻本（索书号：201.243 01582）。

⑤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十五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1090页。

⑥陈先行、郭立暄编著：《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附版本考》下册，第503页。

⑦王国维撰，王亮整理：《传书堂藏书志》卷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458页。

通便利、商贸繁荣之外;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,汪氏等故家携藏书避难至此,带来了大量的善本书籍,也是不可回避的历史境遇。

(三)金顺甫奔走各地售书

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元年间,书商金顺甫曾携书至清江浦,将汪氏藏书之善本售予杨以增、于昌进。此后的八九年间,金顺甫往来于江浙各地,携书游走,陆续将汪氏藏书售至各藏书家手中。

1. 元和

胡珽,字心耘,号琳琅主人,有藏书处曰"琳琅秘室"。胡珽为浙江仁和(今杭州)人,寓居苏州定慧寺巷。叶昌炽称"心耘所居在吾郡定慧寺巷"①。胡珽跋杨以增、胡珽刻本《尔雅郭注义疏》落款作"咸丰六年丙辰七月仁和胡珽识于苏城鳟谿定慧里"②。定慧寺巷位于苏州城内东南隅,属元和县辖境。汪士钟所居之山塘街则在城外西北,隶属长洲县。两地虽分属两县,然相距不远,书籍往来亦颇为便利。

咸丰元年至三年,胡珽为刊印《琳琅秘室丛书》,开始从书商处访求各种善本,主要为张金吾、汪士钟等藏书家散出之本。如咸丰二年冬,书商金顺甫先后持宋本《吴郡图经续记》《茅亭客话》至,胡珽分别以番银七十饼和四十饼易得。咸丰三年,金顺甫又携明正统刊黄丕烈校本《丁鹤年集》售予胡珽。除金顺甫外,徐省甫(名绳祖)也曾参与汪氏藏书的售卖,咸丰三年六月携旧抄本《鹪林子》售予胡珽③。胡珽曾收得汪氏旧藏宋元明善本及精抄本十数种,或以之为底本,或以之为校本,刊印入《琳琅秘室丛书》。其中《吴郡图经续记》《茅亭客话》皆以汪氏藏宋本为底本,《鹪林子》以汪氏藏旧抄本为底本。对于宋本的异文"另纸记出",皆"作校勘记于后",书中的提行、避讳缺笔皆仍其旧④。《丁鹤年集》则以张金吾爱日精庐影元抄本为底本,以汪氏藏黄丕烈校勘明正统刻本为校本,过录黄氏校记,并将黄跋及各家题诗按原书次序刊印。其中宋本《茅亭客话》、旧抄本《鹪林子》、黄丕烈校本《丁鹤年集》,今皆下落不明,得益

---

①叶昌炽著,王锷、伏亚鹏点校:《藏书纪事诗》卷六,北京燕山出版社,2008 年,第 516 页。

②郝懿行:《尔雅郭注义疏》卷末,国家图书馆藏清咸丰六年(1856)杨以增、胡珽刻本(索书号:字 111.1 865.1),叶一。

③以上分别参见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清咸丰三年(1853)仁和胡氏木活字印本《琳琅秘室丛书》之《吴郡图经续记》《茅亭客话》《丁鹤年集》《鹪林子》各书卷末胡珽题识。

④《琳琅秘室丛书例言》,《琳琅秘室丛书》卷首,叶一。

于书商的贩售和胡珽的刊印,我们方能一窥各书面貌。

书商金顺甫与胡珽关系密切,不仅为其带去大量汪氏旧藏善本,还充当其学术"代理",代为搜访古书。胡珽信佛,致力于收集释家典籍,编撰有《净土圣贤录续编》四卷。咸丰二年,胡氏在收得《佛祖统纪》《佛祖通载》两书后,又托人访求宝洲法师《释氏稽古略》,有跋文记访书经过云:

> 未几,书友张仲声自浙西来,余询及是书,仲声曰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称有元刊本。今所见者,唯明刻耳。即明本想彼时刷印无多,故传世亦希。余乃托多人访求,久之,绝无应者。一日,于友人处见三十五峰园汪氏书目载有元刻《释氏通鉴》及此书,余欲购之而无由。逾月,金顺甫来,令其代为觅之,《释氏通鉴》则已售去,幸此尚存,索白金十二两,余以其数易以番银得之。①

元刻本《释氏稽古略》传世稀少,胡珽托多人访求却久久没有回应,即便见到汪氏书目有著录,也还是欲购无由,最后才由金顺甫代为觅得,可见访书之不易。金顺甫作为职业书商,专业技能出众,又常年经手汪氏藏书,对其各类善本的存藏、流散非常熟悉,称得上是一位顶尖的"学术代理人"。

2. 常熟

乾隆末年,瞿绍基在常熟以东的古里镇创建铁琴铜剑楼,经瞿镛继承,咸丰间传至瞿秉渊(字镜之)、秉清(字濬之)兄弟,已历三代。季锡畴和王振声被瞿氏兄弟聘用,馆于铁琴铜剑楼,"任以校雠之事"②,编订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。李芝绶曾造访铁琴铜剑楼,"信宿书斋,与王、季两君谭艺不倦"③。季、王、李三人,与书商金顺甫多有往来。

常熟县位于长洲县西北方向,二者同属苏州府。咸丰七年十一月,书商金顺甫携汪氏旧藏至常熟,季锡畴假留钱楚殷校本《新刊详增补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》,校勘瞿氏藏明正德刻本④。十二月,金顺甫又携书至,王振声日记载:"十六日己亥……吴门书客金顺甫以艺芸书舍汪氏书来,

---

①陈先行、郭立暄编著:《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附版本考》上册,第482页。

②张瑛:《恬裕斋续藏书记》,仲伟行、吴雍安、曾康编著:《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7年,第61页。按,季锡畴,字范卿,号菘耘,江苏太仓人。王振声,字宝之,号文村,江苏昭文(今常熟)人,道光十七年举人,精研经史、音韵,长于校勘。

③李芝绶:《虹月归来图序》,瞿镛编纂: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附录,第703页。标点略有改动。按,李芝绶,字升兰,号缄庵,江苏昭文(今常熟)人,道光十九年进士,精于鉴别。

④季锡畴:题识,吕祖谦:《新刊详增补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》卷首。

阅之至夜分，略记如左。”王振声经眼汪氏藏书，有宋本《资治通鉴》二百九十四卷、《忘忧清乐集》一卷，残宋本《刘后村先生集》三十八卷，元本《朱文公易说》二十三卷、《书蔡氏传辑纂注》六卷，写本《师古篆韵》六册①。瞿《目》著录宋刻本《忘忧清乐集》云：“旧藏士礼居，后入艺芸书舍，湖贾金仁甫携以见示，购之，以备‘杂艺’一门。”②据王振声经眼，当时金顺甫携去售卖的书中就有宋刻本《忘忧清乐集》，瞿《目》所称“金仁甫”当为误记。可见，金顺甫曾多次前往常熟售书。咸丰九年，季锡畴告知李芝绶“有书贾携山塘汪氏旧藏数种”，李氏“以重值得之”。李芝绶所收汪氏藏书可能就是购自金顺甫，但金顺甫所携之本多被他人购去，故李氏仅得数种。咸丰庚申乱起，李芝绶奔走避难，将藏书“庋置董溪，委之而去，迨云城收复，所藏太半遭劫火”，明刻本《玉山名胜集》幸而保存。同治五年，赵宗建四十初度，李芝绶以此书相赠③。后又递经蒋汝藻、丁祖荫、张乃熊等人收藏，流传至今。

3. 松江

松江府位于苏州的东南方向，太平天国运动时仅部分地区遭受战乱。韩氏世居于此，是晚清著名藏书世家。韩应陛，字鸣唐，一字对虞，号绿卿，有藏书处曰“读有用书斋”。先后得宋元古本、旧抄本四百余部，多黄丕烈、顾广圻、汪士钟诸家散出之物，其中黄跋本达 60 余部④。缪荃孙《华亭韩氏藏书记》云：“先生与常熟之瞿，金山之钱，上海之徐、郁同时收书，玉轴牙签，名钞旧刻，所积约十余万卷。”⑤咸丰五年至十年间，韩应陛陆续购得黄丕烈、汪士钟等故家藏书，达到读有用书斋收书之高峰。韩应

①王振声：《播琴山馆杂录》，《王文村杂著十二种》第六册，上海图书馆藏稿本（索书号：T09633-40），叶十九至二十一。按，《王文村杂著十二种》稿本八册，为王振声著作汇编。第六册书衣题《播琴山馆杂录》，第一至十二叶为王振声录《真山民集》《说文部首》《说文部首归母图》，第十四至二十一叶为王振声咸丰七年日记。上海图书馆官网已公布电子影像，所引叶码为网站公布书影的次序。

②瞿镛编纂：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十五，第 398 页。

③李芝绶：题识，顾瑛：《玉山名胜集》卷首，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刻本（索书号：403. 258 14263）。

④详参李军：《松江读有用书斋韩氏家世考》，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2 年第 4 期，第 62—70 页。

⑤缪荃孙：《艺风堂文漫存·癸甲稿》卷三，缪荃孙著，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：《缪荃孙全集·诗文》第 1 册，凤凰出版社，2014 年，第 573 页。标点略有改动。

陛每得一书,必于书衣作简短题识,记录得书时间、得自何家和购书价格。民国间,书商邹百耐在经手韩氏藏书时,摘录出书内各家题跋,编纂为《云间韩氏藏书题识汇录》。韩应陛所得黄丕烈藏书,主要购于黄氏晚年开设的滂喜园书肆,缪荃孙谓"咸丰丁巳、戊午之间,犹时至金阊收书"①当即指此。而韩氏所得汪士钟藏书,则主要来自书商金顺甫的上门售卖。

韩应陛收得汪氏藏书的数量不在瞿、杨、郁三家之下,凡汪氏所藏或有黄跋者悉收之,故宋元明刻、旧抄、精校本皆有。如咸丰七年,韩应陛收得残宋本《礼记》。咸丰八年五月,韩应陛于苏州金顺甫处见宋抄《太玄经》;七月,购得明许宗鲁刊本《国语》;十一月十五日,得就堂和尚抄本《闲闲老人滏水文集》。咸丰九年十一月朔日,金顺甫持澹生堂抄本《尹和靖论语解》归韩应陛,价洋一元七角。又嗣雅堂抄本《唐书志》价十元,明抄本《廛史》价洋三元,丛书堂抄本《陆士龙文集》,皆为韩应陛收得。部分书籍如汪氏藏宋本《通鉴纪事本末》,因书商索价过高而未收②。

咸丰年间正值兵燹,书商的售书地点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的战争局势息息相关。其时书商金顺甫贩运汪氏藏书,售予瞿秉渊、杨以增、胡珽、韩应陛等人,即以长洲为中心,北达常熟,西北抵清江浦,东南经元和而至松江一带。

除金顺甫外,其他书商活动亦有可考者。如咸丰七年秋,书商席楚白携汪氏旧藏至常熟,其中有宋刻初印本《乐全先生文集》,季锡畴"假以校勘,历旬余而竟",校正瞿氏藏旧抄本讹误颇多③。咸丰九年,韩应陛于书友蒋恕斋处得残宋本《三国志》,席楚白持残宋本《东坡集》归韩应陛④。这些书商的售书活动不仅使汪氏藏书在短时间内迅速转移,免于战争的

①缪荃孙:《艺风堂文漫存·癸甲稿》卷三,缪荃孙著,张廷煞、朱玉麟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·诗文》第1册,第573页。

②邹百耐纂,石菲整理,陈先行审定:《云间韩氏藏书题识汇录》,第6、22—25、116—117页。按,国家图书馆藏清初抄本《滏水文集》(索书号:08500)、明末祁氏澹生堂抄本《论语解》(索书号:07941),上海图书馆藏明嗣雅堂抄本《唐书志》(索书号:829228-37),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抄本《廛史》(索书号:308 07261)所载韩应陛题识,《云间韩氏藏书题识汇录》皆未收。笔者已全面整理韩氏藏书题识,拟另文揭出。

③瞿启甲辑:《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》卷四,第233页。按,此旧抄本《乐全先生文集》现藏台北汉学研究中心(索书号:402.52 10134)。

④邹百耐纂,石菲整理,陈先行审定:《云间韩氏藏书题识汇录》,第19、152页。

破坏，还丰富了各地藏书家的收藏，促成韩应陛等新的藏书大家的崛起，同时对藏书家和学者的书籍校勘、出版活动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三、坐店经营：同光间汪氏藏书转售中的书商活动

咸丰庚申之后，汪氏藏书散失殆尽，经过书商的持续贩售，绝大部分善本已流入各地藏书家手中。少量书籍则流落书肆、书摊，被一直保存至同治、光绪间。同时，汪氏藏书在新的藏家手中再次散出，又经书商转售予下一任藏家，进入新一轮流通。

（一）汪氏藏书在书肆的留存

汪氏藏书散入书肆后，因各种原因，无法迅速售出，因此在苏州、上海等地的书肆中还留存有部分汪氏藏书，等待“有缘人”的购藏。

同治二年正月，丁丙流离迁徙至上海，直至同治三年三月返杭，期间出入书肆，购藏各类书籍。丁氏所得汪氏藏书，一部分应当购于此时，如同治二年购得明初刊本《荆南倡和集》①。同治五年又至苏州访书，在绿润堂书坊经眼汪氏旧藏影宋抄本《舆地纪胜》，但“以价昂未购”②。丁氏藏书现多归于南京图书馆，难得一见。据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③著录及各版本图录、古籍资源库所公布者，初步统计丁氏所得汪氏旧藏有 20 余种，如南京图书馆藏宋刻《唐书》残本（索书号：GJ/EB/112092）、宋刻本《医说》（索书号：GJ/EB/110891）、明成化刻本《香溪先生范贤良文集》（索书号：GJ/111264）、明刻本《荆南倡和诗集》（索书号：GJ/111897）、明抄本《大统历注》（索书号：GJ/EB/110812）、清影宋抄本《唐女郎鱼玄机诗》（索书号：GJ/111080）、清影明抄本《太和正音谱》（索书号：GJ/EB/111981）、清抄本《竹洲文集》（索书号：GJ/EB/111279）及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清影宋抄本《却扫编》（索书号：308 07297）等。

同治四年八月二十日，赵烈文于常熟书肆见宋本《仪礼疏》，有黄丕烈、顾千里跋，因索二百金高价，未能购得④。此即汪士钟所藏、《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》著录本，也是道光十年汪氏艺芸书舍影刻本之底本。此

---

①石祥：《八千卷楼书事新考》，第 22—23 页。

②石祥：《八千卷楼未刊题跋五则辑释》，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》2021 年第 3 期，第 147—148 页。

③丁丙著，曹海花点校：《善本书室藏书志（外一种）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6 年。

④樊昕整理：《赵烈文日记》第 3 册，中华书局，2020 年，第 1315 页。

宋本《仪礼疏》自赵烈文经眼后下落不明。

同治四年至八年间,莫友芝旅居上海、苏州,将所见善本书籍随笔记录,后由其子莫绳孙汇编成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。莫氏在书肆见到的汪氏旧藏,可能也是在庚申之乱时流散者。如同治六年初冬苏城有人持售的宋本《张子韶孟子传》,仲冬在沪上书市所见宋刻残本《舆地广记》(后归丁日昌),同治八年秋在吴门市中经眼的宋湖北提举茶盐司小字本《汉书》①。莫友芝本人也曾收得部分汪氏藏书,如同治五年中秋在云间肆中收得汪氏藏影抄元本《皇元风雅》②。也有其他藏书家转售的,如同治六年十月肆贾以宋巾箱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相示,为汪氏归于徐渭仁之书;十一月有人求售宋刻《太平御览》残本,乃黄丕烈、汪士钟旧藏而自湖州徐氏散出者③。

(二)书肆对汪氏藏书的转售

1. 醉六堂

吴申甫,浙江归安(今湖州)人,经营醉六堂书铺,先开设于湖州城内,后迁至上海。其人"熟于宋椠、元钞、名校善本,其他元、明旧刻,以及乾嘉名流校刊丛书。经、史、小学诸书,搜罗甚广,盖一时书贾中之卓卓者"④。

醉六堂为光绪间上海著名书肆,萧穆、莫友芝、江标等人常往之购书。萧穆同治十一年之后的日记中记录下多个上海书肆,醉六堂即为萧穆常访问者之一⑤。吴申甫亦善装书,如同治八年二月,朱澂请吴申甫重装明嘉靖刻本《皇明文衡》二十册⑥。

方功惠碧琳琅馆所藏珍籍秘本极多。对于其藏书来源,李希圣《雁影斋题跋》曾云:"郁氏书至精者为丁禹生中丞豪夺,余以万金售之陆存

①莫友芝: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卷一,莫友芝撰,邱丽玟、李淑燕点校,杜泽逊审定: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　持静斋藏书记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8 年,第 25、33、29 页。

②莫友芝: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附录卷一,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　持静斋藏书记要》,第 114 页。

③莫友芝: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卷一,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　持静斋藏书记要》,第 22、41 页。

④蒋凤藻:《心矩斋尺牍》,第 18 页。

⑤详参徐雁平:《编织的艺术:萧穆日记中的书籍与文学世界》,第 71—76 页。

⑥陈先行、郭立暄编著:《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附版本考》下册,第 791 页。

斋。存斋挑其重本,由上海书贾吴申甫归方氏。”①今见方功惠所得汪氏旧藏仅有宋刻递修本《三国志》、宋本《新雕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》、宋本《宗镜录节要》三种②,后两种曾散入醉六堂书肆。蒋凤藻与吴申甫往来密切,曾在其肆中见宋本《白氏六帖》,并云“乃是南宋椠本,此在陆存翁所得之外者”③。陆心源已收得明文渊阁旧藏北宋本《白氏六帖类聚》三十卷,故去此重复之本。《皕宋楼藏书志》云“苏州汪氏有南宋刊本,题曰《新雕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》”④,即指此本。宋本《宗镜录节要》在汪氏后归蔡氏醉经轩,又散落至上海醉六堂,江标光绪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曾见此本,三月十九日日记又云:“《宗镜录节要》二卷,见《艺芸书舍书目》宋板类,实则元印而元刻者也。盖此书小黑口,三燕尾,首叙影写,确为元本无疑。”⑤

由以上数端,可见汪氏藏书之流转,其藏书散出后,由书商售予郁松年、蔡廷桢,郁、蔡书散,又由书商售予方功惠,是以书商串联起了晚清书籍流通的网络。

2. 世经堂

侯念椿,人称侯驼子,湖州书估,在苏州玄妙观开设世经堂书肆。精于鉴别,“目睹各家藏书兴废,分别宋元椠刻校钞源流,如辨毫厘”⑥。侯念椿业书年久,见闻很广,江标曾拟一巨册付之,“属以取四十年中所见所闻藏书流转佚事,及版本价值、装潢卷帙等,杂记一册”,对于“黄荛圃、顾千里、胡心耘、劳季言、顾湘舟、汪阆源、叶苕生各家事,须琐屑详记”⑦。

侯念椿交游广泛,与徐康、叶昌炽、蒋凤藻、江标等藏书家都有往来。

---

①李希圣撰,李慧标点,杜泽逊审定:《雁影斋题跋》卷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8年,第342页。与汪璐辑《藏书题识》、傅以礼《华延年室题跋》合一册。按,方功惠,字庆龄,号柳桥,湖南巴陵人。有碧琳琅馆。方氏卒后,其藏书被转运至北京出售,请李希圣鉴定。李氏记录考证,撰成《雁影斋题跋》四卷。

②按,后两种见于《雁影斋题跋》著录(李希圣撰,李慧标点,杜泽逊审定:《雁影斋题跋》卷一,第317—318页)。宋本《新雕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》各卷题名不一,《雁影斋题跋》著录作“新雕添注白氏事类出经六帖”,今依卷端题名。

③蒋凤藻:《心矩斋尺牍》,第19页。

④陆心源编,许静波点校:《皕宋楼藏书志》卷五九,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6年,第1035页。

⑤江标著,黄政整理:《江标日记》上册,第162—163页。

⑥江标:《徐康〈前尘梦影录〉序》,黄政辑:《江标集》,凤凰出版社,2018年,第206页。

⑦江标著,黄政整理:《江标日记》上册,第337—338页。

如咸丰四年三月，侯氏“于吴中故家敝箧中”检得明徐惟起旧藏宝文堂刻本《晁氏三先生集》，携售予胡珽①。汪氏藏书归于梁溪蔡氏、上海郁氏、仁和胡珽者，或经侯念椿之手，售予陆心源、蒋凤藻、姚觐元等人。今将文献记载世经堂所售汪氏藏书梳理于下，以观其大略：

（1）光绪五年闰三月初八日，叶昌炽在世经堂书肆见叶梦得《春秋考》《岩下放言》《避暑录话》抄本，其中《春秋考》有汪士钟印②。

（2）光绪十五年十月廿九日，侯念椿将黄丕烈、汪士钟旧藏本《始丰稿》售予江标③。

（3）汪氏藏宋本《夷坚志》，后归于陆心源皕宋楼，光绪五年刻入《十万卷楼丛书》。《重刻宋本夷坚志甲乙丙丁四集序》云：“阮氏得之吾乡严久能，后归吴门黄尧〔荛〕圃，尧〔荛〕圃归于汪阆原，阆原归于胡心耘。余从胡氏得之。”④陆氏自称得自胡珽，而据蒋凤藻记载，实际上是“托侯念椿经手”⑤。

（4）汪氏藏明抄残本《新刊监本册府元龟》，乃难得之精本，后归蔡氏醉经轩。蔡氏书散后，落入侯念椿之手，被姚觐元收归咫进斋。蒋凤藻认为“《册府元龟》亦非钞本不可，若明刊删节改易不少”，当时侯念椿携至蒋氏处求售，而蒋氏“交臂失之”，后来回忆起颇觉遗憾⑥。

此外，书商席楚白也在上海经营书肆。咸丰十一年五月，李芝绶在崇川避难，曾与赵宗建同游上海，从席楚白书肆购得宋巾箱本《荀子》⑦。席氏书肆中或许还存有部分汪氏藏书，尚未可知。汪氏部分藏书也有流落书摊⑧者，如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五日，姚觐元在周姓冷摊购得汪氏旧藏宋

---

①胡珽：跋，《晁氏四种》卷末，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）晁氏宝文堂刻本（索书号：17442）。

②叶昌炽：《缘督庐日记》第1册，第571页。

③江标著，黄政整理：《江标日记》下册，第387页。

④陆心源著，王增清点校：《仪顾堂集》卷五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81页。

⑤蒋凤藻：《心矩斋尺牍》，第39页。

⑥蒋凤藻：《心矩斋尺牍》，第45页。

⑦李芝绶：跋，《荀子》卷末，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（索书号：07891）。按，此本为胡惠孚小重山馆旧藏，经书商席楚白之手，归赵宗建旧山楼，亦可见书商对典籍保存与流转之作用。

⑧书摊是书肆、书坊之外的又一书籍集散地。与书肆不同的是，部分书摊无固定经营场所（店铺）。

刻小字《通鉴纪事本末》残本一册①。

(三)新藏家散书与书商经手

这一时期各家藏书渐次散出。汪士钟藏书中部分精本归于郁松年宜稼堂,郁氏藏书在同治初也开始散失,其中宋元旧椠、名家抄校大多先归于丁日昌持静斋。直到光绪六年,陆心源才购得郁氏剩余旧书②。陆心源《元刊元印玉海跋》云:"及余自闽中罢归,有以郁氏书求售者,余阅其目,是书在焉,因以善价得之。"③从"求售"一词的表述来看,经手者很有可能也是书商。陆氏还挑选其中重复之本,交给书商吴申甫,后来大多被方功惠买去。陆心源所得其他汪士钟旧藏,也有由书商经手者,如《明钞皇鉴笺要跋》云:"此即张氏旧物,前有'爱日精庐藏书印',后归汪士钟,余从金阊书估得之。"④

南京藏书家孙文川咸丰后寓居上海,曾收得汪氏部分旧藏⑤,今可考者有宋刻本《唐僧弘秀集》、清初抄本《金台集》、清抄本《鼓枻稿》等。其中《鼓枻稿》跋云"癸亥秋九予于上海得之"⑥,癸亥为同治二年。后来孙氏书亦散,光绪十年夏,书贾仲仁卿收得其藏书出售,李盛铎以番饼十六枚易得宋本《唐僧弘秀集》,遂归木犀轩插架⑦。莫友芝所得汪氏藏书,如安国刻本《初学记》,也曾流落市廛,后为潘景郑收得⑧。书商胡友林与江标相熟,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,携书至江标处求售,江标购得汪氏旧藏周锡瓒校本《唐语林》、明抄本《藏一话腴》、明天顺本《绀珠集》⑨。其中明抄本《藏一话腴甲集》二卷《乙集》二卷,为朱彝尊旧藏,自汪氏散出

---

①姚觐元著,董婧宸、董岑仕整理:《姚觐元日记》,凤凰出版社,2022年,第323页。

②详参陈熙、王涵笑:《楼台海上:郁松年与宜稼堂藏书》,《图书馆杂志》2024年第11期,第123—124页。

③陆心源著,冯惠民整理:《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》,中华书局,2009年,第401页。

④陆心源著,王增清点校:《仪顾堂集》卷十七,第334页。

⑤孙文川,字澂之,一字伯澂,号耐冷居士,江苏上元(今南京)人。有读雪斋、商壶馆。

⑥《木犀轩藏书书录》卷四云:"书中夹签一纸,为上元孙澂之所书。"(李盛铎著,张玉范整理:《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5年,第329页)按,《木犀轩藏书书录》未收孙氏跋,此据汤志波、孙悦:《明初虞堪诗集版本考录》,《文津学志》第十二辑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9年,第59页。

⑦李盛铎著,张玉范整理:《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》,第30—31页。

⑧潘景郑:《著砚楼书跋》,第206页。

⑨江标著,黄政整理:《江标日记》上册,第335页。

后归于王振声，盖书商金顺甫携书至常熟铁琴铜剑楼时为王氏购得。卷后有王振声校勘记并跋，乃据毛氏汲古阁抄本所校。又经由书商胡友林售与江标，后归邓实风雨楼①、周越然言言斋递藏，现藏四川省图书馆（索书号：27010018）。可见，这一时期的书商，在坐店经营的基础上，也携书上门，售书方式较为灵活。

同治至光绪年间，汪士钟藏书在新藏家手中再次散出，又经书商转售至下一任藏家。书商吴申甫、侯念椿、胡友林等人以开设书铺、坐店经营为主，兼顾上门售书，实现了汪氏藏书的再次流转。直至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，邓邦述还能在吴门书肆购得汪氏藏明抄本《续世说》六册②。

结语

汪士钟艺芸书舍所蓄典籍既博且精，藏有宋刻本 310 余部、元刻本 120 余部，名家抄校本亦不下 300 部，汇聚了当时中国古代典籍之精粹，堪称一代文献渊薮。汪氏藏书散出后，大都经由书商运作，在各藏书家之间流转（见图 1）。从身份特征看，这些书商的职业属性不尽相同。鲍芳谷既贩书，又藏书、抄书，其子鲍廷爵也业书，并开设抱芳阁书店。吴申甫则于贩书之外，兼善装书。此外，书商中亦有擅长写样者，如乌程沈锡堂③。从籍贯来看，金顺甫、沈锡堂、吴申甫、侯念椿皆为湖估，庞昆圃、

①傅增湘曾经眼该本，记云："邓秋枚藏书，癸亥十月十一日记于上海。"（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八，第 599 页）按，邓实，字秋枚，广东顺德人，近现代学者、出版家。有风雨楼，搜罗秘籍甚富。辑刻有《风雨楼丛书》《风雨楼秘籍留真》。

②邓邦述：《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》卷五，邓邦述撰，金晓东整理，吴格审定：《群碧楼善本书录　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0 年，第 438 页。按，明抄本《续世说》十卷，有黄丕烈、邓邦述跋，现藏台北汉学研究中心（索书号：310. 21 08306）。

③于昌进藏书散出后，最早经眼者即为沈锡堂。咸丰七年冬月，沈锡堂携宋刻元抄补本《重雕改正湘山野录》至胡珽处，胡氏据以传录，"藏之恬裕斋"，而原书则售予宗源翰，又传其子宗舜年。详参胡珽、瞿启甲：跋，释文莹：《重雕改正湘山野录》卷末，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（索书号：04240）。作为写样者，沈锡堂至少曾为道光二十八年刘喜海刻本《六艺纲目》（"苕溪沈锡堂写刊"）、道光二十九年朱绪曾刻本《棠阴比事》（"苕溪沈锡堂模仿，武林王世贵刻镌"）、同治三年刻本《二百兰亭斋古印考藏》（"乌程沈锡堂仿宋，武林李星垣刻字"）三部书写样。详参郑幸：《清代刻工与版刻字体》，中华书局，2023 年，第 341—343 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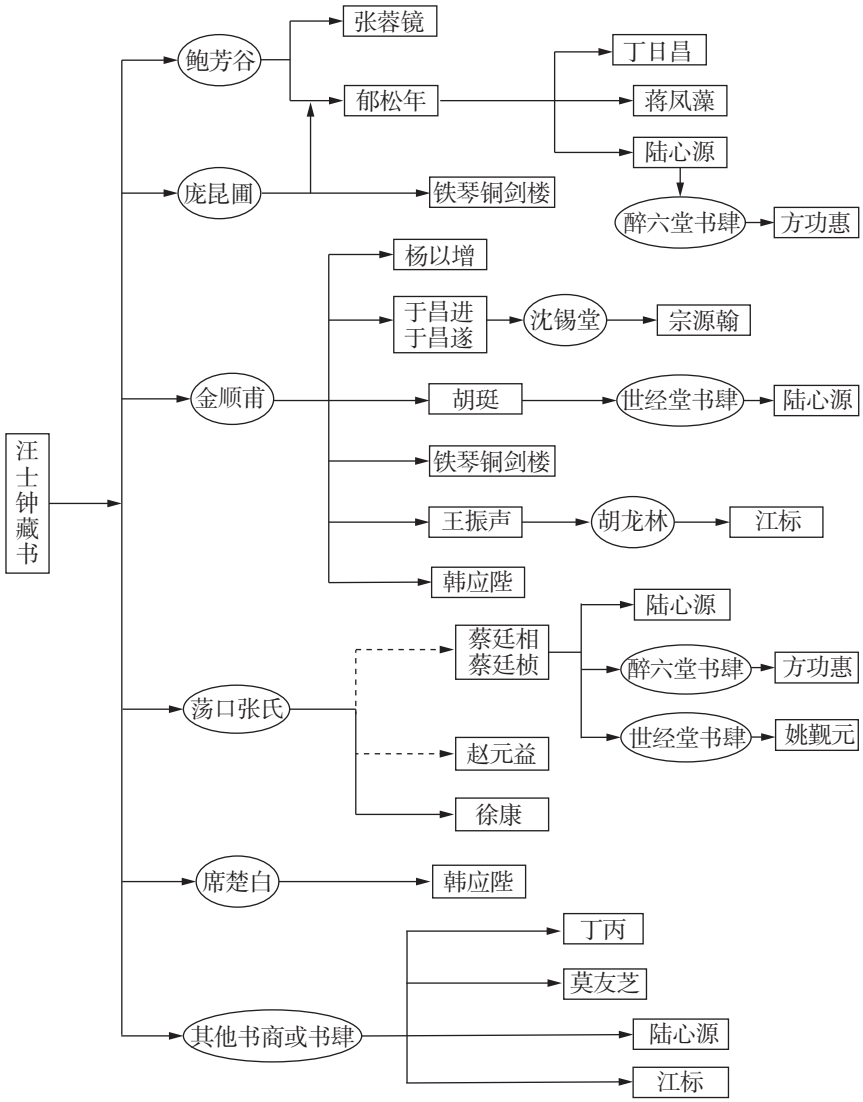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　书商与汪士钟藏书流转示意图①

鲍芳谷是常熟人,张氏为荡口籍,不出江浙两地,侧面反映出江浙地区藏书文化和书籍贸易的繁荣,也凸显了太湖流域水运网络在书籍交流中的作用。总体来看,这些书商的经营模式有两种。其一,开设书肆售卖。这是一种固定经营模式,可集中展示书籍,形成规模效应,既方便藏书家对

①图中以方框代表藏书家,以椭圆框代表书商或书肆,以黑色箭头标示书籍流通方向。实线表示关系可确认,虚线则表示关系尚待考证。本图仅呈现文中涉及的部分汪氏藏书流转情况,不能反映其全貌。

比选购,也提升书商的经营效率。同治、光绪间汪氏藏书的流转主要是以这种交易模式进行。其二,携书上门求售。这是一种移动经营模式,不受空间限制,可以迅速且准确地将特定书籍卖给特定藏书家。登门售书的形式,在明末已较为流行,这在不少藏书家的题跋中都有记载,如明抄本《贞白先生陶隐居文集》冯彦渊跋云:"崇祯己卯清明后一日,湖贾邵姓者持来。"①上门售书的经营模式能更好地实现书籍的跨区域流通,如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,书商吴良甫从苏州至海宁吴骞家中售书,吴骞用宋椠《传灯录》和明刻《诗传疏义》易得宋本《说苑》②。太平天国运动期间,不少书肆被战火焚毁、劫掠,书商无稳定经营空间,无法长期驻留某地,同时藏书家为避兵燹多逃离原籍,或隐居乡间、或暂居安全城镇,较为分散,因此书商多采取携书游走、上门售书的流动方式。登门售书与坐店经营两种方式相结合,更好地促成晚清书籍的快速流通。

书商不同于一般商人,他们所从事的是具有文化属性的贸易活动,因而除了商业本质之外,还自带一层独特的文化底色。正因如此,书商的中介功能也并不仅限于书籍的交易环节。他们可担任藏书家的"代理人",代为寻访目标典籍,提供版本信息,甚至借出书籍以供校勘;有时则充当藏书家之间的"介绍人",成为促成书籍流通的桥梁。无论如何,书商始终是藏书网络中穿针引线的关键角色,是推动书籍流转与学术传播的"无形之手"。达恩顿(Robert Darnton)指出:"书商在供求之间所起的中介角色,以及他们起到的文化催化剂作用,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。"③艾尔曼(Benjamin Elman)强调:"考据学者还需要一个由藏书家、出版家、书商组成的交流网络,以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。"④汪氏藏书流转中的书商活动,一定程度上回答或印证了以上学者的结论,同时构建出一个从藏书家到书商再到藏书家的"珠线模式",为藏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。

汪士钟藏书的流散是晚清藏书史上的重要事件,成就了一大批新的藏书家,重塑了清代藏书格局,改变了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藏书面貌,形

---

①王重民: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 年,第 494 页。

②吴骞著,张昊苏、杨洪升整理:《吴兔床日记》,凤凰出版社,2015 年,第 14 页。

③[美]罗伯特·达恩顿著,萧知纬译:《拉莫莱特之吻:有关文化史的思考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,2022 年,第 125 页。

④[美]艾尔曼著,赵刚译:《从理学到朴学: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2 年,第 111 页。

成“南瞿北杨”的鼎立局面。汪氏藏书散出后,究竟有多少书籍经过书商之手,具体数量已难确考。而书商在汪氏藏书流转过程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无可替代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如果没有鲍芳谷等书商的积极收购,许多善本恐怕早已亡于不识书的子孙后代手中;如果没有金顺甫、席楚白、蒋恕斋等书商的努力,汪氏藏书很可能毁于战火,更不可能辗转流布至淮安、常熟、元和、上海等地,进而成就郁氏宜稼堂、杨氏海源阁、瞿氏铁琴铜剑楼、韩氏读有用书斋等一批著名藏书家。若真如此,将对中国传统典籍与文化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。作为书籍贸易的中介者,书商填补了典籍递藏链条中的断层,有力促进书籍流通与知识传播,在文献保存与文化传承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汪士钟贾而好儒,富而收书;书商虽以贩书谋利为业,然其“文化贸易”客观上促成古籍的保存与流传,二者皆在历史进程中以不同方式参与并推动典籍传承,为中华文脉之延续作出重要贡献。

本文初稿撰成后,承蒙杜泽逊老师悉心指正,又得《文献》匿名审稿专家惠赐宝贵意见。在材料搜集与整理过程中,苏悦、王杨杨、林才伟等友人亦给予诸多帮助。谨此一并致谢!

【作者简介】吴善松,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目录版本学、中国书籍史、藏书史。